

魯迅

三閒集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五九年·北京

三 開 集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北京東四西大街320號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書名：三開集
頁數：200 字數：50,000 冊本：550×1168 mm₃₂ 印張：5₁₆ 版次：1
1958年1月北京第1版 1959年8月北京第2次印制
印数：31201—41200 册
定价：3.00 元

1960.6

出版說明

本書這次出版，曾經依照作者亲自編校的初版，并且參照各篇最初發表時的雜志和報紙，作了初步的校勘。凡在以往各種版本中存在而為我們所已發現的排印上的錯誤，都已經加以改正。同時，我們又試加了一些注釋，附在全書的後面，在正文中則標以1、2、3……的號碼。

本書最初于一九三二年九月由上海北新書局出版，此後印行的版本都和初版相同。在一九三八年由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輯、魯迅全集出版社出版的《魯迅全集》中，本書編入第四卷；一九四一年魯迅全集出版社印行《魯迅三十年集》時，本書也曾收入。

本書這次試加的注釋，不妥、錯誤和不充分的地方一定不少，懇切希望讀者指正。

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部

一九五六年十二月

BAC68/08 03

目 录

序言	1
一九二七年	
无声的中国	7
怎么写(夜記之一)	13
在鐘樓上(夜記之二)	21
辞願頌剛教授令“候审”(并来信)	30
匪笔三篇	32
某笔两篇	37
述香港恭祝聖誕	40
吊与資	44
一九二八年	
“醉眼”中的朦胧	49
看司徒乔君的画	55
在上海的鲁迅啓事	57
文艺与革命(并冬荪来信)	59
扁	67
路	68
头	70

序 言

我的第四本杂感《而已集》的出版，算起来已在四年之前了。去年春天，就有朋友催促我编集此后的杂感。看看近几年的出版界，创作和翻译，或大题目的长论文，是还不能说它寥落的，但短短的批评，随意而谈，就是所谓“杂感”者，却确乎很少见。我一时也说不出这所以然的原因。

但粗粗一想，恐怕这“杂感”两个字，就使志趣高超的作者厌恶，避之惟恐不远了。有些人，每当意在奚落我的时候，就往往称我为“杂感家”，以显出在高等文人的眼中的鄙视，便是一个证据。还有，我想，有名的作家虽然未必不改换姓名，写过这一类文字，但或者不过图报私怨，再提恐或玷其令名，或者别有深心，揭穿反有妨于战斗，因此就大抵任其消灭了。

“杂感”之于我，有些人固然看作“死症”，我自己确也因此很吃过一点苦，但编集是还想编集的。只因为翻阅刊物，剪帖成书，也是一件颇觉麻烦的事，因此拖延了大半年，终于没有动手。一月二十八日之夜，上海打起仗来了，越打越凶，终于使我们只好单身出走，书报留在火线下，一任它烧得精光，我也可以靠这“火的洗礼”之灵，洗

掉了“不滿于現狀”的“衆感家”這一個惡證。²殊不料三月底重回舊寓，書報却絲毫也沒有損，于是就東翻西覓，開手編輯起來了，好像大病新愈的人，偏比平時更要照照自己的瘦削的臉，摩摩枯皴的皮膚似的。

我先編集一九二八至二九年的文字，篇數少得很，但除了五六回在北平上海的講演，³原就沒有記錄外，別的也彷彿并無散失。我記得起來了，這兩年正是我極少寫稿，沒處投稿的時期。我是在二七年被逼吓得目瞪口呆，⁴离开廣東的，那些吞吞吐吐，沒有胆子直說的話，都載在《而已集》里。但我到了上海，却遇見文豪們的筆尖的圍剿了，創造社，⁵太陽社，⁶“正人君子”們的新月社⁷中人，都說我不好，連并不標榜文派的現在多升為作家或教授的先生們，那時的文字里，也得時常暗暗地奚落我几句，以表示他們的高明。我當初還不過是“有閑即是有錢”，⁸“封建余孽”或“沒落者”，後來竟被判為主張殺青年的棒喝主義者⁹了。這時候，有一個從廣東自云避禍逃來，而寄住在我的寓里的廖君，¹⁰也終於忿忿的對我說道：“我的朋友都看不起我，不和我來往了，說我和这样的人住在一起。”

那時候，我是成了“这样的人”的。自己編着的《語絲》，實乃無權，不單是有所顧忌（詳見卷末《我和語絲的始終》），至于別處，則我的文章一向是被“擠”才有的，而且下正在“剷”，我投進去干什么呢。所以只寫了很少的一點東西。

現在我將那時所做的文字的錯的和至今還有可取之處

的，都收納在这一本里。至于对手的文字呢，《魯迅論》和《中國文艺論戰》¹¹中虽然也有一些，但那都是峨冠博帶的礼堂上的陽面的大文，并不足以窺見全体，我想另外搜集也是“杂感”一流的作品，編成一本，謂之《圍剿集》。如果和我的这一本对比起来，不但可以增加讀者的趣味，也更能明白別一面的，即陰面的战法的五花八門。这些方法一时恐怕不会失傳，去年的“左翼作家都为了卢布”說，就是老譜里面的一着。¹²自問和文艺有些关系的青年，仿照固然可以不必，但也不妨知道知道的。

其实呢，我自己省察，無論在小說中，在短評中，并無主張将青年来“杀，杀，杀”¹³的痕迹，也沒有怀着这样的心思。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論的，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，青年必胜于老人，对于青年，我敬重之不暇，往往給我十刀，我只还他一箭。然而后来我明白我倒是錯了。这并非唯物史觀的理論或革命文艺的作品蠱惑我的，我在广东，就目睹了同是青年，而分成两大阵营，或則投書告密，或則助官捕人的事实！我的思路因此轟毀，后来便时常用了怀疑的眼光去看青年，不再無条件的敬畏了。然而此后也还为初上陣的青年們呐喊几声，不过也沒有什么大帮助。

这集子里所有的，大概是两年中所作的全部，只有書籍的序引，却只将觉得还有几句話可供参考之作，选录了几篇。当翻檢書报时，一九二七年所写而沒有編在《而已集》里的东西，也忽然發見了一点，我想，大約《夜記》是因为原想另成一書，講演和通信是因为淺薄或不关紧要，所以

那时不收在內的。

但現在又將這編在前面，作為《而已集》的補遺了。我另有了一樣想頭，以為只要看一篇講演和通信中所引的文章，便足可明白那時香港的面目。我去講演，一共兩回，第一天是《老調子已經唱完》¹⁴，現在尋不到底稿了，第二天便是這《無聲的中國》，粗淺平庸到這地步，而竟至于惊為“邪說”，禁止在報上登載的。是這樣的香港。但現在是這樣的香港几乎要遍中國了。

我有一件事要感謝創造社的，是他們“擠”我看了几種科學底文艺論，明白了先前的文學史家們說了一大堆，還是糾纏不清的疑問。並且因此譯了一本蒲力汗諾夫的《藝術論》¹⁵，以救正我——還因我而及于別人——的只信進化論的偏頗。但是，我將編《中國小說史略》時所集的材料，印為《小說旧聞鈔》，以省青年的檢查之力，而成仿吾以無產階級之名，指為“有閑”，而且“有閑”還至于有三個，¹⁶却是至今還不能完全忘却的。我以為無產階級是不會有這樣鍛煉周納法的，他們沒有學過“刀筆”。編成而名之曰《三閑集》，尙以射仿吾也。

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四日之夜，編訖并記。

一九二七年



無声的中国¹

——二月十六日在香港青年会講——

以我这样没有什么可听的无聊的講演，又在这样大雨的时候，竟还有这許多来听的諸君，我首先应当声明我的郑重的感謝。

我現在所講的題目是：《無声的中国》。

現在，浙江，陝西，都在打仗，那里的人民哭着呢还是笑着呢，我們不知道。² 香港似乎很太平，住在这里的中国人，舒服呢还是不很舒服呢，別人也不知道。

發表自己的思想，感情給大家知道的是要用文章的，然而拿文章來達意，現在一般的中国人还做不到。这也怪不得我們，因为那文字，先就是我們的祖先留傳給我們的可怕的遺产。人們費了多年的工夫，还是難于运用。因为难，許多人便不理它了，甚至于連自己的姓也寫不清是張还是章，或者簡直不会写，或者說道：Chang。虽然能說話，而只有几个人听到，远处的人們便不知道，結果也等于無声。又因为难，有些人便当作寶貝，像玩把戏似的，之乎者也，只有几个人懂，——其实是不知道可真懂，而大多数的人們却不懂得，結果也等于無声。

文明人和野蛮人的分別，其一，是文明人有文字，能够把他們的思想，感情，借此傳給大众，傳給将来。中国虽然有文字，現在却已經和大家不相干，用的是难懂的古文，講的是陈旧的古意思，所有的声音，都是过去的，都就是只等于零的。所以，大家不能互相了解，正像一大盘散沙。

将文章当作古董，以不能使人認識，使人懂得为好，也許是有趣的事罢。但是，結果怎样呢？是我們已經不能將我們想說的話說出來。我們受了損害，受了侮辱，总是不能說出些应說的話。拿最近的事情來說，如中日战争，“拳匪”事件，民元革命³这些大事件，一直到现在，我們可有一部像样的著作？民国以来，也还是誰也不作声。反而在外国，倒常有說起中国的，但那都不是中国人自己的声音，是別人的声音。

这不能說話的毛病，在明朝是还没有这样厉害的；他們还比較地能够說些要說的話。待到滿洲人以异族侵入中国，講历史的，尤其是講宋末的事情的人被杀害了，講时事的自然也被杀害了。⁴ 所以，到乾隆年間，人民大家便更不敢用文章來說話了。所謂讀書人，便只好躲起来讀經，校刊古書，做些古时的文章，和当时毫無关系的文章。有些新意，也还是不行的；不是学韓，便是学苏。韓愈苏軾他們，用他們自己的文章來說当时要說的話，那当然可以的。我們却并非唐宋时人，怎么做和我們毫無关系的时候的文章呢。即使做得像，也是唐宋时代的声音，韓

愈苏轼的声音，而不是我們現代的声音。然而直到現在，中國人却还要着这样的旧戏法。人是有的，沒有声音，寂寞得很。——人会沒有声音的么？沒有，可以說：是死了。倘要說得客气一点，那就是：已經啞了。

要恢复这多年無声的中国，是不容易的，正如命令一个死掉的人道：“你活过来！”我虽然并不懂得宗教，但我以为正如想出現一个宗教上之所謂“奇迹”一样。

首先来嘗試这工作的是“五四运动”前一年，胡适之先生所提倡的“文学革命”。⁵“革命”这两个字，在这里不知道可害怕，有些地方是一听到就害怕的。但这和文学两字連起来的“革命”，却没有法国革命的“革命”那么可怕，不过是革新，改換一个字，就很平和了；我們就称为“文学革新”罢，中国文字上，这样的花样是很多的。那大意也并不可怕，不过說：我們不必再去費尽心机，學說古代的死人的話，要說現代的活人的話；不要将文章看作古董，要做容易懂得的白話的文章。然而，单是文学革新是不够的，因为腐敗思想，能用古文做，也能用白話做。所以后来就有人提倡思想革新。思想革新的結果，是發生社会革新运动。这运动一發生，自然一面就發生反动，于是便釀成战斗……。

但是，在中国，剛剛提起文学革新，就有反动了。不过白話文却漸漸風行起来，不大受阻碍。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就因为当时又有錢玄同先生提倡廢止汉字，用羅馬字母来替代。⁶这本也不过是一种文学革新，很平常的，但被不喜欢改革的中国人听见，就大不得了了，于是便放过了

比較的平和的文學革命，而竭力來罵錢玄同。白話乘了這一個機會，居然減去了許多敵人，反而沒有阻碍，能够流行了。

中國人的性情是總喜歡調和，折中的。譬如你說，這屋子太暗，須在這裡開一個窗，大家一定不允許的。但如果你主張拆掉屋頂，他們就會來調和，願意開窗了。沒有更激烈的主張，他們總連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。那时白話文之得以通行，就因為有廢掉中國字而用羅馬字母的議論的緣故。

其實，文言和白話的優劣的討論，本該早已過去了，但中國是總不肯早早解決的，到現在還有許多無謂的議論。例如，有的說：古文各省人都能懂，白話就各處不同，反而不能互相了解了。殊不知這只要教育普及和交通發達就好，那时人人都能懂較為易解的白話文；至于古文，何嘗各省人都能懂，便是一省里，也沒有許多人懂得的。有的說：如果都用白話文，人們便不能看古書，中國的文化就灭亡了。其實呢，現在的人們大可以不必看古書，即使古書里真有好東西，也可以用白話來譯出的，用不着那麼心驚膽戰。他們又有人說，外國尚且譯中國書，足見其好，我們自己倒不看么？殊不知埃及的古書，外國人也譯，非洲黑人的神話，外國人也譯，他們別有用意，即使譯出，也算不了怎樣光榮的事的。

近來還有一種說法，是思想革新緊要，文字改革倒在其次，所以不如用淺顯的文言來作新思想的文章，可以少

招一重反对，这话似乎也有理。然而我們知道，連他长指甲都不肯剪去的人，是决不肯剪去他的辮子的。

因為我們說着古代的話，說着大家不明白，不听见的話，已經弄得像一盤散沙，痛痒不相关了。我們要活过来，首先就須由青年們不再說孔子孟子和韓愈柳宗元們的話。时代不同，情形也两样，孔子时代的香港不这样，孔子口調的“香港論”是無从做起的，“吁嗟闢哉香港也”，不过是笑話。

我們要說現代的，自己的話；用活着的白話，將自己的思想，感情直白地說出来。但是，这也要受前輩先生非笑的。他們說白話文卑鄙，沒有价值；他們說年青人作品幼稚，貽笑大方。我們中国能做文言的有多少呢，其余的都只能說白話，难道這許多中国人，就都是卑鄙，沒有价值的么？至于幼稚，尤其沒有什么可羞，正如孩子对于老人，毫沒有什可羞一样。幼稚是会生长，会成熟的，只要不要衰老，—腐敗，就好。倘說待到純熟了才可以动手，那是虽是村妇也不至于这样蠢。她的孩子学走路，即使跌倒了，她决不至于叫孩子从此躺在床上，待到学会了走法再下地面来的。

青年們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。大胆地說話，勇敢地进行，忘掉了一切利害，推开了古人，將自己的真心的話發表出来。——真，自然是不容易的。譬如态度，就不容易真，講演时候就不是我的真态度，因为我对朋友，孩子說話时候的态度是不这样的。——但总可以说

些較真的話，發些較真的聲音。只有真的聲音，才能感動中國的人和世界的人；必須有了真的聲音，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。

我們試想現在沒有聲音的民族是那幾種民族。我們可听到埃及人的聲音？可听到安南，朝鮮的聲音？印度除了泰戈爾，別的聲音可還有？

我們此后實在只有兩條路：一是抱着古文而死掉，一是舍掉古文而生存。

怎么写

——夜記之——

写什么是一个問題，怎么写又是一个問題。

今年不大写东西，而写給《莽原》的尤其少。我自己明白这原因。說起来是極可笑的，就因为它紙張好。²有时有一点杂感，子細一看，觉得沒有什么大意思，“不要去填黑了那么潔白的紙張，便廢然而止了。好的又沒有。我的头里是如此地荒蕪，淺陋，空虛。

可談的問題自然多得很，自宇宙以至社會國家，高超的还有文明，文艺。古來許多人談过了，将来要談的人也将無窮無尽。但我都不会談。記得还是去年躲在廈門島上的时候，因为太討人厭了，終于得到“敬鬼神而远之”式的待遇，被供在圖書館樓上的一間屋子裡。白天还有館員，釘書匠，閱書的学生，夜九时后，一切星散，一所很大的洋樓里，除我以外，沒有別人。我沈靜下去了。寂靜漫到如酒，令人微醺。望后窗外骨立的亂山中許多白點，是丛冢；一粒深黃色火，是南普陀寺的琉璃燈。前面則海天渺茫，黑絮一般的夜色簡直似乎要扑到心坎里。我靠了石栏远眺，听得自己的心音，四远还仿佛有無量悲哀，苦恼，